

法国小说在中国

王 苏 生

在中国近代文学史上，真正以较大的规模译介法国文学（主要是法国小说），是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的。林纾的一部《巴黎茶花女遗事》，一经面世，便“风行大江南北”，为这场大的译介活动隆重地拉开了序幕。在随后长达近一个世纪的岁月中，尽管中国历史的进程颇多磨难，但译介西洋文学的浪潮却从未有过停息，其中，法国小说的译介一直占据着重要而突出的地位。

毋庸讳言，20世纪初叶，新植入的法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是幼稚的，它的匆忙、草率乃至混乱比比皆是，瑕瑜互见，茅盾称它是中国译界的“初学步”阶段。这个阶段约延续了二十年的时间，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才逐渐步入正轨。这二十年，是法国文学在中国译介和传播最不规范、最令人无所适从的二十年，同时又是最值得探究、最具有宝贵史料价值的二十年。它既对今日重新研究和考证这段历史提出了新的紧迫的要求，也为这种研究和考证提供了充裕的余地。本文所要做的，便是对法国小说在这个时期被译介到中国来的情况做这样一番研究和考证，基本上以时间为序，为它勾勒出一条较为清晰的历史发展的轨迹来。在一定程度上，世界各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走着与法国文学大致相同的历程，因此，这条轨迹具有着普遍意义上的代表

性。

一、《茶花女》，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作家

第一部真正具有文学价值的法国小说，是林纾（署名冷红生）和刚从巴黎归国的王寿昌（署名晓斋主人）以文言笔法合译的小仲马的名作《茶花女》。据阿英考证，此书最早的版本，由林氏家刻，1898年在福州印行，林纾自题《巴黎茶花女遗事》。它是中国近代文学史公认的外国文学翻译的开篇之作。它的行世，长达十数年，影响了整整一代中国的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胡适、周作人、钱钟书等著名作家无一例外都受过它的积极影响。“小仲马”这个名字，也随着一部《茶花女》，成为20世纪初中国读者最熟悉的法国作家了。在林纾共20余部法国小说翻译中，小仲马是他仅有的两个流传至今未经改动的作家译名之一，另一个是法国资产阶级启蒙文学的先驱作家孟德斯鸠。1926年，刘半农（署名刘复）再译小仲马的这部名剧时，正式以《茶花女》定名，它便是今日流行的《茶花女》这一译名的最早版本了。在其后的二十年间，以同一译名翻译此书的作者达八、九人之多，如1927年的夏康农，1930年的秦瘦鹃，1934年的李连萃，1936年的王慎之等等，至新中国建立前夕，《茶花女》成为在中国各种版本存世最多的一部法国小说了。

这一时期，译介小仲马作品最多的，非林纾莫属：除《茶花女》外，1916年，他与王庆通合作译出《血华鸳鸯枕》（林京与朱角1983年重译这部小说的译名为《克莱孟梭事件》）；同一年，林、王再次携手合译《香钩情眼》（今译《安东尼》）；1918年又译出《鹦鹉缘》共三编（今译《四女和一鹦鹉的奇遇》）；两年后，两人最后合译的小仲马小说是《伊罗埋心记》（今译《银盒》）。林纾一生中共与七、八人合作翻译过法国小说，其中与王庆通合作的次数最多，其最大的成果，便集中显现在对小仲马

小说的翻译上。林纾是清末民初最具影响的西洋文学翻译家，以文言笔法而译法国小说，林纾算得上是中国第一人了。

二、四部《旅行》使儒勒·凡尔纳名声大噪

与小仲马几乎同时介绍到中国来的，是法国科幻小说作家儒勒·凡尔纳。相对而言，他的小说并不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但因其新奇、怪诞，颇受当时市民阶层的欢迎。即使是中国的智识阶层，面对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狂轰乱炸，痛定思痛，对这些小说所宣扬的奇幻世界也由敬畏到向往，产生出浓厚的兴趣来。1900年，薛绍徽女士托名陈绎如，译出凡尔纳的《八十日环游记》，作者则被她译为房朱力士。这是凡尔纳在中国的第一个汉译名。两年后，《小说林》将其再版，书名改为《环球旅行记》；1906年，此书又有有正书局的刊本，数年之中连印三版，足见其受欢迎的程度。应当指出的是，薛绍徽是中国近代文学史上屈指可数的几位女翻译家之一。在法国文学翻译上，她虽较林纾为晚，但作为女翻译家，却堪称是第一个。凡尔纳的这部小说，还有1914年叔子的另一个译本，名为《八十日》，作者被译为裘尔俾奴。1958年，沙地再译时，定名《八十天环绕地球》，便是今天流行的译名了。

1902年，梁启超译出凡尔纳的《海底旅行》，在他主办的《新小说》上刊出，称“焦士威奴”所作。这是梁启超以“开发民智”为宗旨的西洋科学小说翻译的代表之作。这部小说的正规译名是《海底两万里》，解放后曾一版再版，颇受读者青睐。

受梁启超的影响，鲁迅也以染指凡尔纳的小说，迈出了他外国文学翻译最初的一步。1903年，他以周逵为笔名，用文白夹叙的笔法译出《月界旅行》，由进化社出版，不过凡尔纳被他误译为美国作家查理士·培伦·鲁迅在小说前言中称：“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一语道明他

翻译科学小说的宗旨与梁启超如出一辙。第二年，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再印此书时，定名为《环游月球》，作者译为焦奴士·威尔士。这个书名与李仓人和李庆星1981年合译本的取名《环绕月球》已相差无几了。

在这同一年，仅隔两个月，鲁迅又以之江索士的笔名译出凡尔纳的第二部小说《地底旅行》，作者被他译作威尔奴。鲁迅一生中只有三部法国小说翻译，其中凡尔纳占了两部。在鲁迅步入文坛之初，对法国文学，尤其是凡尔纳的小说表现出的这种兴趣，是很耐人寻味的。《地底旅行》另有一名，即为我们今天所熟悉的《地心游记》，为杨宪益和闻时清1959年重译此书时所取。

短短四年间，接连有四部《旅行》一举问世，大开了中国读者的眼界，也使凡尔纳在中国名声大噪。

除这四部《旅行》外，梁启超另一部凡尔纳小说的译作《十五小豪杰》也非同凡响。1904年，梁与罗孝高合作，分别用饮冰子和披发的笔名将其译出。1931年远生重译这部小说时，定名为《十五少年》。1946年又有章士佼的一个译本《十五小英雄》，凡尔纳被译成巴诺。两年后，施落英再译时，书名与梁译相同，作者却变为佛尔诺。其实，他们所译的，仅是凡尔纳长篇小说《荒岛奇遇》中的一部分，这部小说的全译本1988年由赵琪与陶法义译出时，即取此名。另一全译本的书名是《孤岛历险记》，为刘板盛重译时所取。

三、浪漫派文学大师雨果风靡中国

使中国广大读者真正品味到法国小说绮丽、精妙特色的，其实是从浪漫主义文学大师雨果开始的。雨果是世界级文学家，法国文学传入中国不久，中国文学界和中国读者已然领略到了他的小说的丰采。

1903年，鲁迅署名庚辰，在《浙江潮》月刊发表了由日文版

转译的雨果小说《哀尘》。这是雨果最重要的长篇小说《悲惨世界》在中国的第一个译本，也是鲁迅翻译的第一部西洋小说。第二年，陈独秀与苏曼殊分别以陈由己和苏子谷为笔名再译了这篇名著，题名《惨世界》，雨果则被他们译为噐俄，在十至二十年代，“噐俄”这个译名流行一时，得到中国作家和读者的广泛认同。1907年，林纾不甘寂寞，以《孤星泪》为题再译此书^①。商务印书馆1929年付梓刊行的新译本取名《可怜的人》，是这部小说自流行以来最完整的一个译本，由李丹和方于合作译出。两年后柯蓬洲以《少年哀史》为名重译了这部小说。直到1936年，当李敬祥以《悲惨世界》作题再次向公众推出此书时，这个译名便最后确定下来。应当指出的是，在此之前，《悲惨世界》的译本大多为节译，最前面的三种则用文言文写成。

作为浪漫主义小说代表作的《巴黎圣母院》，直至1920年才有人染指。这一年，俞忽翻译了雨果的这部大作，并给它取了一个颇具时代特色的名字《活冤孽》。1928年，曾朴译出这部名著的歌剧本《钟楼怪人》。《巴黎圣母院》这个译名最早是由陈敬容定下来的，时间是1949年。

雨果晚年的最后一部重要作品《九三年》的中译本，出现得反较《巴黎圣母院》为早。1913年，曾朴以东亚病夫为笔名译出时，给它取了一个与今日译法相差无几的名字《九十三年》。1921年，林纾与王文钟合译此书，仍按惯例自撰了一个标题《双雄义死录》，并将雨果译为预勾。在二十年代，林纾一直很固执地沿用这个独特的译法，不愿与新派们通用的“噐俄”靠拢，显现出他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格格不入。

与《九十三年》同年出版的，还有雨果的剧作《银瓶怨》，译者仍是曾朴。1930年他以东亚病夫的笔名再版此书，根据译音将题目改为《项目乐》。不过，这个剧在中国第一次公演时的本子为天笑和卓呆所译，取名《牺牲》，时间是1910年。这是继

《茶花女》、《热血》之后，在中国公开上演的第三部法国剧。1946年时还有张道藩的一个译本，名为《狄四娘》。标准的译法当属1983年刘小惠重译时所取的《安琪罗》。

雨果的早期小说作品，在20世纪也有中译本，如1910年包天笑以包笑生为笔名翻译了他的《铁窗红泪记》，这是雨果在七月革命前写的小说中最具人道主义特色的一部。这部小说还有邱韵铎1929年翻译的一种，取名《死囚之末日》。1949年黄峰以《铁窗末日记》再译此书，即为今日流行的名称了。

雨果的其他一些小说或剧作，其译名变化较大的还有：狄楚青用笔名平情居士在20年代翻译的《噫有情》，1980年罗玉君再译时定名为《海上劳工》。1905年包天笑译出雨果的《侠奴血》，鲁膺1956年的译本取名《布格—雅加尔》。刘半农1927年依据译音翻译雨果的剧作《克洛特格欧》，沈宝基在1959年重译时改为《葛洛特·格》。

关于雨果的译名，除上面列举的几种，还有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1917年）中译的虞哥；高仲鸣1922年在《贫人诗》中用的许峨等。最早取雨果这一译法的，应是1927年刘半农在翻译《克洛特格欧》时所用。

四、小仲马为子，大仲马为父

作为小仲马的父亲，大仲马的作品翻译到中国来的时间比他儿子要晚几年。但除了《茶花女》之外，大仲马的小说受欢迎的程度，却远较小仲马为高。他的那些骑士传奇小说，情节逶迤，高潮频出，常使读惯了章回式旧体小说的中国读者，于紧张、新奇之中，体验到一种全然不同的异国情趣。大仲马是继雨果之后，被大规模介绍到中国来的又一位法国作家。

1907年，伍光建以君朔的笔名，从英文转译了大仲马历史系列小说《达特安三部曲》中最著名的一部《三剑客》。为适应当

时读者的口味，他将书名译为《侠隐记》。10年后，无我重译时将其改为《侠骨忠魂》，由泰东图书馆印行。1936年曾孟浦仍以《侠隐记》为名再译此书。进入四十年代，先有徐仲年的一个译本《三剑客》，时隔未久，又有李青崖的另一译本《三个火枪手》。这两个译名皆合题意，难分高下，一度并存并行，后因以这部小说改编而成的法国电影在中国公演，《三剑客》的名字便随电影脱颖而出，得到更多的认同。

伍光建译出《侠隐记》的第二年，接着又译出《续侠隐记》，即《三剑客》的续集《二十年后》。这两部书，经过茅盾的标点校注，更具特色。1939年曾孟朴以同样的名字再译大仲马的这部小说。它的正式名称《二十年后》，则为周爱琦等人1982年翻译时所取。

一般被视作《二十年后》续集的第3个大部头，即《法宫秘史》，仍为君朔（伍光建）所译，时间是1908年。在短短两年间，大仲马的三部曲接连问世，构成一个完整系列，使不懂法文，只能借助英译本转译的伍光建，成为二十世纪初大仲马作品最权威的翻译者了。伍译《法宫秘史》后，云南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在1983年又各自独立推出的新译本，分别取名为《布拉日隆子爵》和《布拉热洛纳子爵》。似乎是为了赶速度，争先后，两家出版社均组织多人同时翻译，相比之下，倒不如伍光建来得从容不迫。在他们之后，还有朱果毅、王莹与孟鞠如等人合译的两种，分别题名《小侠隐记》和《双剑勤王录》，定名似乎过于随意，且有明显的滞后感。

大仲马的另一代表作《基督山伯爵》，在巴黎发表的当日即引起轰动，便如同它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来一样。1906年抱器室主人以《几度山恩仇记》为名将它首次披露给中国读者。包天笑重译时已是1919年，取名为《大宝窟王》。翟伊文1939年的译本名曰《炼狱》。四十年代中，先后有徐蔚南的《基督山恩仇记》和

蒋学模的《基度山伯爵》两种译本，都是今日流行的名称。

值得一提的是，继《三剑客》之后，大仲马又接连写出亨利三世三部曲，打头的一篇《马哥王后佚史》1908年由曾孟朴译出。在中国，这是第一部用白话文直接从法文原著直译过来的法国长篇小说，在此之前，流行于世的法国小说大多是从英、日文版转译而来。少许直译本，又是文言笔法，因此，《马哥王后佚史》的问世，开创了法国文学翻译的一片新天地，曾朴翻译此书，其意义比作品本身更大得多。这部小说还有另两种译本，分别由郝运和张英伦主笔，各自取名为《玛戈王后》和《玛尔戈王后》。

此三部曲的第二部，即《玛戈王后》续集，正式名称为《蒙梭罗夫人》，为陈祚敏1983年所译。但早在1909年，已有洪观涛的一个译本存世，书题《地亚小传》。

大仲马的小说，1908年还有林纾与李世中合译的一种，名《玉楼花劫》，使这一年成为大仲马小说翻译的丰收年，共达四大部。这部小说解放后还有罗玉君的一个译本，即《红屋骑士》。

作为一名通俗小说家，大仲马在法国文学史上并不享有崇高的地位，但却拥有最广大的读者。在中国，也是这样。

五、“短篇小说之王”莫泊桑

莫泊桑享年仅43岁，在他短促的一生中，创作的短篇小说却多达三百余部，被法朗士称作法国的“短篇小说之王”。中国读者认识莫泊桑，正是从他的短篇小说开始的。

1909年，周树人（鲁迅）、周作人两兄弟共同推出他们的第一部翻译小说集《域外小说集》，其中选了莫泊桑的一个短篇《月夜》，莫泊桑被译为摩波商。这是一种独特的译法，因出自两位文学大师之手，故值得一记。但由于该小说集十年间总共只售出21册，所以摩波商这个译名一直未能流行开来。《月夜》另有一名，即1920年袁弼所译的《月光》。

1910年，冷血（陈景韩）编译一部外国小说集《侠客谈》，内收莫泊桑一个短篇《义勇军》。

胡适在1917年的《新青年》上，接连两期译出莫泊桑的《二渔夫》和《梅里哀》。未出两年，又在《每周评论》推出《弑父之子》，后改名为《杀父母的儿子》编入他的小说集中。胡适不谙法文，一生总共从英文本转译过五篇法国短篇小说，莫泊桑便占了三篇。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胡适曾大力倡导法国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文学，故在《二渔夫》译文前特置一词“莫泊三乃自然主义之距子”。

在这同一年，周瘦鹃翻译莫泊桑的小说《伞》，发表于他编译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的中卷《法兰西之部》，文前附有作者小传。在中国，这是最早，也是最详细的一个关于莫泊桑生平及其著作的文字介绍了。

茅盾译莫泊桑的《一段弦线》，刊在1919年的《时事新报·学灯》上，笔名一个“冰”字。第二年沈泽民步其兄茅盾之后，译出莫氏《两个小的兵》和《归来》，皆刊登于《小说月报》。这三篇小说在二十年代有多种译本行世。

这些早期的莫氏小说译本，今天多已绝版，难以觅寻。倒是他的另几篇佳作，因建国后曾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几乎变得家喻户晓。

一是《项链》，1920年已有崔雁冰的译文《项圈》。第二年蒋琴轩再译时取名《项饰》。1922年又有陈子谷译的《颈串》。余梓长的《假玉》和李青崖的《软项圈》则分别译于1923年和1924年。一部短篇五年间被接连译出5次，足见其艺术的魅力。解放后流行的是郝运和赵少侯的译文，便是作为中学语文教材的《项链》了。

二是《我的叔叔于勒》，1922年陈生译为《我的叔父虚勒》。李青崖在第二年重译时取名《我的舒尔叔父》。

不过，说到在中国的影响，它们似乎还比不上莫泊桑最著名的中篇《羊脂球》。它最早是由李青崖翻译过来的（1924年），当时即取此名，流行至今未变。1942年谢希平再译，定名《脂肉糰》。1957年台北志文出版社推出黎烈文的又一译本《脂肪球》。如果仅从名称上看，大陆的译法更胜一筹。

莫泊桑的长篇小说共有六部，以《漂亮的朋友》最为出色。1929年雷晋笙译出此书，定名《漂亮朋友》；后又有李青崖的译本《俊友》，1945年何敬翻译时取名《美男子》，解放后再版，改为今日流行的名称，即《漂亮的朋友》。

其余五部长篇在二十年代皆有中译本行世：《人心》，1920年由李劫人译出；罗玉君1954年的新版本译为《我们的心》。最好的译法，当属1989年郑永慧的翻译《我们的爱情》。《一生》，1926年已有徐蔚南的译本，它与解放后索夫的《她的一生》，和李青崖的《人生》相比，在译法上更合原意。《兄与弟》为旅翁1928年所译；1933年黎烈文在《自由谈》上以连载形式再译，定名《两兄弟》，未出3年即重版，依据译音，改名《笔尔和哲安》。《爱焰》，1931年由彭兆良译出；1945年索夫译作《爱情的火焰》，1950年再版，根据题目原文改为《如死一般强》；1985年有李仓人和林京的最新译本《不可抗拒的爱》，应是此书最好的译名了。《温泉》在二十年代末已有李青崖的译本，其后的各种版本均以此名为题，未有大的变化。

20世纪初，在法国作家中，莫泊桑的译名花样最多。自周氏兄弟的摩波商后，1919年周瘦鹃在《勋章》中译作毛柏桑，同年在《自杀俱乐部》中又改为毛巴桑；1920年伯卫在《补椅人》中用莫泊三。在二十年代，莫泊三这种译法最为流行，不过同时存在的其他译法也不鲜见，如袁振英的莫白霜，郑伯奇的莫白桑，曾仲鸣的莫泊山等。

六、批判现实主义的一族：司汤达、 梅里美、巴尔扎克和福楼拜

若以莫泊桑划为一界，作为他的前辈和老师的福楼拜，以及与福楼拜并列为19世纪上半叶批判现实主义文学杰出代表的另三位法国作家司汤达、梅里美和巴尔扎克，他们的作品传入中国的时间，反而较莫泊桑这个后生辈为晚，除个别几部外，大多始译于二十年代中后期。

1、批判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第一任旗手司汤达，其代表作《红与黑》标志着他文学创作的最高成就，1927年由马宗融译出，作者被译为斯当达尔；1936年又有黎烈文的同名翻译，作者司汤达，这可能是司汤达这一规范译法最早的应用了。在其后多达十一、二种的不同版本中，小说译名几乎没有变化，以至今天专门有人写文章加以考证，以破译“红”与“黑”的各自所指。

司汤达的另一重要作品《巴马修道院》（1979年郝运译），目前所能找到的最早译本是徐迟1948年翻译的《帕尔玛宫闱秘史》。作为司汤达中短篇系列小说《意大利遗事》中的压卷之作《卡斯特洛的女修道院长》（1986年陈玠译），还有另两个译本：1936年李健吾的《贾司陶的女主持》和1949年赵瑞霖的《嘉思德乐的女主持》。

2、梅里美是法国19世纪最富艺术魅力的作家之一，他的作品以中短篇小说为主，行世不多，却篇篇都是玃珠之作。最能体现他思想特色和艺术风格的，是他的两部中篇《高龙巴》和《卡门》，其中又以后者更为著名。这部小说的第一个译本，是樊仲云1926年在《小说月报》上连载的《嘉尔曼》，作者译为梅礼美；1935年戴望舒在其小说集中再译时，定名《珈尔曼》；1938年启明书局推出施大悲的译本《卡门》，作者梅里曼。后来，虽然傅雷和叶君健两位高手分别以《嘉尔曼》和《卡尔曼》为名再

译此书，但究竟不如《卡门》来得响亮和明快；1987年郑永慧重译时，便恢复了《卡门》的名称。今天，除小说外，在据此改编的电影和舞剧中，通行的也是《卡门》的译法。

《高龙芭》为戴望舒1935年所译；1945年徐仲年再译时，对书名做了较大改动：《鸫鸟姑娘》。《高龙巴》的规范译法为傅雷解放后所定。

关于美神维纳斯的一篇尤其能打动中国读者的心，1927年鲍文蔚译出此小说，定名《哀耳的维纳》，作者梅立美；次年，曾虚白再译为《神秘之恋神》，又名《依尔村的妮娱丝》，作者梅丽爱；二十年代末另有赵瑞霖的《女神》；1948年黎烈文的译本取名《伊尔的美神》，即是今天流行的译名了。

梅里美这一译名最早是黎烈文在翻译他的反映俄法之战的小说《方型堡之攻克》时所用（1932年）。在此之前，施绛年曾以《炮台之袭取》为名译过此小说。

3、巴尔扎克，这位被恩格斯赞誉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小说大师，在中国，却一直犹抱琵琶半遮面，迟迟未给人以全貌。他的作品传入中国，应当算是早的，但中国读者真正认识他，却又是晚的。这种不协调，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20世纪初中国文学界在法国小说翻译上的幼稚和偏颇。

1914年林纾与陈家麟合作译出巴尔扎克的第一部小说集《哀吹录》，内收4个短篇，计《猎者斐里朴》（1935年穆木天译为《再会》）、《耶稣显灵》（1936年蒋怀青译为《基督在法兰德斯》）、《红楼冤狱》（1936年蒋怀青译为《红楼旅馆》）和《上将夫人》（1927年白冷译为《征发兵》），作者被林纾译作巴鲁萨，这是巴尔扎克在中国的第一个译名。

直至三年后，才又有周瘦鹃翻译的另一短篇《男儿死耳》面世。不过，小说正文前附了一篇六百余字的巴尔扎克小传，却是中国最早介绍这位法国大作家的文字。令人不解的是，从此以

后，巴尔扎克的小说翻译便沉寂下来，直至约20年后的1935年，在郑振铎主编的《世界文库》中才先后推出他的另6个短篇。而最能代表巴尔扎克文学成就的长篇小说，却一部也没有。难怪王任叔在1936年曾撰文曰：“虽然中国有不少懂法文的文学者，然而却把巴尔扎克轻视了。”②

第一部巴尔扎克长篇小说的中译本，是穆木天1936年所译的《欧贞尼·葛朗代》。这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长卷的《外省生活场景》中最著名的一篇。似乎从这时起，中国文学界才在这位法国大文豪面前苏醒过来。这部小说，1944年有韩云波从英文转译的一种，名《犹金妮》，高名凯1946年再译时取名《欧琴妮·葛兰德》；1949年傅雷的译本最后为其定名《欧也妮·葛朗台》。

《乡村生活场景》中的力作《乡下医生》，1938年由黎烈文译出；1982年李金波和黄慧珍的合译本改动不大，名《乡村医生》。

1940年，穆木天再操译笔，推出《巴黎生活场景》中最动人的一篇《从妹贝德》；1951年傅雷又译，定名《贝姨》。同年，穆木天还译出《私人生活场景》中的压卷之作《勾利尤老头子》，这也是令巴尔扎克自己最满意的一部小说，1946年傅雷重译时取名《高老头》。

这个时期，巴尔扎克长篇小说的翻译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几个中国作家身上，但大多数都有傅雷的重译本。1943年穆木天译出《从兄蓬斯》，傅雷随后推出《邦斯舅舅》；1946年高名凯翻译《杜尔的教士》，傅雷再译时取名《都尔的本堂神甫》；1947年高名凯又译《单身汉的家事》，傅雷1962年的重译本改为《搅水女人》，这个译名极为传神，它与上一部皆为《外省生活场景》中的名篇；1949年高名凯还译出《米露埃·雨胥儿》，傅雷1956年的译本为《于絮尔·弥罗埃》。有趣的是，他们各自所取的译

名正好反了过来。

从30年代中期至新中国建立，巴尔扎克《人间喜剧》的全部六个“场景”中，其代表之作大都有中译本行世。若按翻译时间为序，前期以穆木天为多，其小说译名明显带有30年代的痕迹。紧随穆木天之后的是高名凯，他占据了四十年代中期巴尔扎克小说翻译的主阵。进入四十年代末，傅雷后来居上，成为巴尔扎克小说最权威的翻译家，由他刊定的译名一般作为最标准的译法，得到中国读者最广泛的认同。

巴尔扎克的译名，如同他的小说一样来得丰姿多采。在林纾的巴鲁萨之后，1917年又有周瘦鹃的白尔石克，1921年胡愈之的鲍尔扎克，1927年白冷的巴尔若克。巴尔扎克这一标准译法，就笔者所掌握的资料，最早为茅盾在《答苇南先生的信》（1922年载《小说月报》第13卷号外）中所用。不过，巴尔扎克这个名字真正流行起来，却是30年代后期的事情了。

值得一提的是，中国文学界对巴尔扎克的译介虽然较其他许多法国作家为晚，但一旦启步，却后发而先至，迄今，巴尔扎克的作品全集已译出24大卷本，其中许多名篇一版再版，成为最受欢迎的法国小说。与他前期的被冷落，这种结局是令人欣慰的。

4、兴起于19世纪后期的法国自然主义文学的先驱者福楼拜，最早传入中国的作品，是沈泽民1922年在《小说月报》以三期连载的形式译出的《三故事》中打头的一篇《简单的心》，它被茅盾称作是“佛氏些少短篇中的珍珠”。1925年李劫人的译法为《坦白》；李健吾1936年译为《一颗简单的心》。今天还有刘益庚翻译的一种《淳朴的心》（1982年）。

福楼拜面壁四年写成的大作《包法利夫人》，1925年由李劫人首次介绍到中国，用的是《马丹波娃利》这个名字；1927年李青崖再译为《波华荔夫人传》；《包法利夫人》的译名为李健吾1934年翻译此书时所起，即为今日流行之译法。

福楼拜另一部富有强烈政治性的小说《情感教育》，1948年由李健吾译出，但早在1931年，已有吕亦士的一个译本行世，取名《儿童心理的研究》，作者被译为福禄贝尔。

《圣安东的诱惑》和《萨朗波》是福楼拜小说中古典色彩和宗教色彩最浓的作品，前者为李健吾的译本，发表时间是1937年。在他之前（1936年）还有钱公侠从日文版转译的一种，名《圣安多尼之诱惑》，后者有1926年李劫人的一个译本，名《萨郎波》。

七、“梅塘集团”盟主左拉

以莫泊桑为代表的“梅塘集团”的青年作家们，公推左拉为其盟主。随着这一代人登上历史舞台，以巴尔扎克为主将的现实主义文学中的批判味道大为削弱，代之而起的是单纯追求细节真实的自然主义文学，领导这一文学运动的重担，历史地落在了左拉的肩上。

作为盟主，左拉的《磨坊之役》自然成为《梅塘之夜》小说集的压卷之作，1920年由刘延陵译出；空瓶在1923年再译，仅一字之差定名《磨坊之战》；第二年又有WW的同名译本发行。解放后，江影以《磨坊之围》为名重译此书。应当说，散见于三十年间的这几个中译本的名称均切题意，且传神。

左拉长篇系列小说《卢贡—马卡尔家族》中的第七部《小酒店》的问世，一举打破了他的前六部小说默默无闻的尴尬局面，1934年由王了一（王力）首次介绍到中国，却为它起了一个蹩脚的名字《屠槌》。三年后此书再版，王遂将书名改为《酒窟》。

《小酒店》是解放后重版本的最后定名。这部小说还有沈起予1936年的一个译本，取名《酒场》。

家族史第九部《娜娜》的面世，将左拉的文学地位和社会声望大大提高了一步。它是法国文学中最详尽地描写娼妓生活的作品，1934年王了一首次翻译，在中国读者中掀起一个不小的波

澜。焦菊隐和郑永慧在解放后分别重译过这部名著，书名不变。

自《娜娜》之后，左拉几乎每年写出一部家族史小说，其主要作品均有中译本，如《萌芽》，不仅在法国文学史上，而且是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次从正面描写罢工事件的作品，1940年由仇明译出；如《妇女乐园》（1954年侍桁译），早在1931年茅盾即由英文转译，取名《百货商店》；如《金钱》和《家常事》，在三十年代已有金满成的译本；毕修勺和林如稷则几乎同时推出这个系列中的《崩溃》和《卢贡家族的家运》。另一部《巴黎的肚子》，正规的译法过于直白，1949年经李青崖之手译作《饕餮的巴黎》，则好得多。

左拉的中篇小说数《娜依斯·米库兰》著名，1956年由孟安翻译。在他之前，已有毕修勺的一个译本《娜意·米枯伦》，出版时间为1948年。这一年，毕修勺还翻译了左拉早期作品中最重要的一部《岱蕾斯·赖根》，1986年韩沪麟再译时取名《泰蕾兹·拉甘》。

左拉的译名很多，最早为阵独秀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中所用的喇拉（1915年）。1917年先后又有周瘦鹃在《洪水》中的查拉、刘半农在《卖花女侠》中的曹拉。曹拉的译法随后流行开来，成为20年代这位法国文豪通行的译法。其他的译名还有：曾仲鸣在《失业》中的朱拉（1921年），周瘦鹃在《奈他士传》中的佐拉（1920年），刘延陵在《磨坊之役》中的佐治等。

八、一篇《割地》使都德享誉中国文坛

都德的作品，最早也是最轰动的一篇，是胡适1912年在美国留学时翻译的《割地》（后有多种译本，均译为《最后一课》），因内容反映了法奥战争，贴近当时中国的现状及国情，故引起社会上的广泛关注，以至竞相传阅，产生的轰动效应，是自林纾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以后所少见的。

都德的第一部半自传体长篇小说、成名之作《小东西》，1922年由正在法国留学的李劫人首次将其译为中文，取名《小物件》。20年后李利用此书再版的机会，遂正式定名为《小东西》。

继《小东西》之后的另一长篇是《达哈士礼的狒狒》，最先将其推荐给中国读者的也是李劫人，作品发表于1924年。解放后，成钰亭曾取名《达拉斯贡城的达达兰》重译过。达达兰是都德笔下堂吉诃德式的人物，他的以达达兰为主人公的长篇共有三部，成钰亭和李孟安再译时，将三篇合而为一，取名《达达兰三部曲》，于1988年一次出齐。

描写巴黎小市民庸俗生活的《小弗罗蒙和大里斯勒》，目前仅找到解放后的几个版本，其中以盖家常与岚沁合译的最为规范，即上面所列一种。另有两种则是译者根据小说内容杜撰而成的译名，即徐吉贵的《巴黎姑娘》和刘方的《一个女人的沉沦》。

《沙弗》是一部爱情小说，曾改编成剧本公演，场场爆满，1931年由王了一译出；第2年王实味又译，取名《萨芙》；徐蔚南的译本名称改动较大，单字《荡》，1942年自费发行。

以上便是都德最重要的4部长篇在中国的译介概况。

都德的短篇小说集也是4部，流传最广的是其中的第一部《磨坊文札》，1927年由成绍宗和张人权合作译出。贾芝和葛陵1950年重译时，取名《磨坊书简》。

都德的译名，周瘦鹃在《伤心之友》中译为陶苔（1917年）；谢冠生在《塞根先生的山羊》中译作杜德（1921年）；曾仲鸣的《一局的台球》取陶德，1930年罗玉君在翻译他的剧作《婀娜女郎》时，用的也是杜德，但此作另有一名《阿莱城的姑娘》，为张志渊同年所译。

九、活着便被介绍到中国来的法国当代 作家法朗士和罗曼·罗兰。

只要查阅一下他们的生辰年表，便可知，当五四时期的中国作家将崇敬的目光投射向他们的作品时，这两位法国作家仍然健在，并且笔耕不辍，以至他们的某些作品，付梓未久便已传入中国。他们的小说所具有的鲜明的现代特征，是传统的法国小说难以比拟的，令当代中国作家着迷的，正是这一点。

1.法朗士是法国当代杰出的左翼进步作家，一个公认的社会主义者。他的第一部获奖作品（法兰西学院奖）《波纳尔之罪》1928年由李青崖译出。在这同一年，依据他的诗歌改编而成的历史小说《黛丝》也由杜衡翻译面世。第二年徐蔚南推出这部小说的新译本《女优泰倚思》。1936年又有王家骥翻译的一种《泰倚思》。解放后傅辛的翻译最后定名《黛依丝》。

法朗士早期小说中的名篇还有《艺林外史》，1930年由李青崖译出。后来利用此书再版的机会，李按题意恢复了它的原名《瘦猫馆》。1933年顾维熊和华堂以《乔加斯突》为名译出了这部小说的另一部分。

《企鹅岛》是法朗士两部幻想小说中的第一部，1935年黎烈文将其译为中文。而他著名的童话小说《蜜蜂》，穆木天在日本留学时（1924年）即翻译过来。这两部小说解放后均有重译本。法朗士晚年最成功的一部小说，也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应算是《诸神渴了》，这部从正面描写法国大革命的小说发表于1912年，但笔者却一直找不到解放前的中译本，只有郝运和肖甘1956年翻译过这部小说，即取此名发表。

法朗士的译音与法国同名，1921年何鲁之在《一簇葡萄》中即将其译为法兰西。法朗士这一规范译法可能是徐蔚南在1925年翻译这同一篇小说时所取，不过小说名改译为《一串葡萄》。在

二十年代初，流行的其他译名还有：耿匡在《叫卖商》中的弗郎司（1920），李玄伯在《二月花月的故事》中的佛朗西（1920），胡愈之在《新文学与创作》中的法朗西（1921），曾仲鸣在《黑克的思想》中的佛兰西（1923）。进入二十年代中期，法朗士的译名逐渐走向规范。

法朗士1921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三年后，当他刚度过自己的八十寿辰不久，便溘然长逝。中国文学界和各阶层民众纷纷举行各种集会，出版多部专集，发表大量文章以示对他的纪念，以至在他死后，博得了比他生前更大的名声。

2、罗曼·罗兰荣获诺贝尔文学奖，尚在法朗士之前。以不足50岁的年龄而获此殊荣，在当时的法国作家中，他是第一个。

奠定罗曼·罗兰在法国文学史上不朽地位的，当然是他最著名的巨制《约翰·克利斯托夫》。这部包括了10大卷本的长篇小说，前后共花去罗曼·罗兰10年的时间，全书于1912年杀青。1926年，他的学生敬隐渔将其译成中文（部分），取名《若望·克利司朵夫》，在《小说月报》上陆续刊出。这部书的全译本最先由傅雷译出，以《约翰·克利斯朵夫》为名于1937年交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后经三联书店、平明出版社再版多次和作者的修改、润色，至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的面世，即成为迄今最为完美的译本了。1944年，这部小说还有钟宪民和齐蜀夫翻译的一种，名《若望·葛利斯朵夫》。

罗曼·罗兰的中篇小说《彼得与露西》连载于1926年的《小说月报》，译者李劫人。两年后，现代出版社为它另出单行本，取名《白利与罗西》，译者叶灵凤。

生前，罗曼·罗兰曾构思了一套规模宏大的名人传记写作计划，1902年动笔，第一部《贝多芬传》一经面世，即受好评，1923年成仿吾以《〈悲多汶传〉序》的形式首次将其介绍到国内。1928年，这部传记的全文即由徐蔚南和梅晦分别译出，各自取名

为《贝多芬》和《贝多芬传》。1937年傅雷再译时，正式定名为《贝多芬传》。

这套传记小说的其他中译本还有：1925年谢颂羔和米星如合译的《甘地小传》，此书另有陈作樑1933年翻译的一种，名《甘地》。余杨灵（徐懋庸）1934年译出《托尔斯泰传》，第二年傅雷以同名再译。傅雷还译过他为法国雕塑大师米开朗基罗所写的传记《弥盖朗琪罗传》，发表于1932年。《卢梭传》和《亨德尔》传，笔者目前仅找到解放后的译本，译者分别为陆琪和严文蔚。

罗曼·罗兰一生共写过八部戏剧，其中最著名的几部皆有中译本，如《爱与死之角逐》，1928年由夏莱蒂与徐培仁合译；第二年梦茵再译，取名《爱与死》；3年后辛予推出《爱与死底角逐》，李健吾1939年的译本取名《爱与死的搏斗》，1944年另有贺之才翻译的一种《爱与死之赌》。在这同一年，贺之才还译出罗曼·罗兰的剧作《丹东》，加上1934年翻译的《七月十四日》，贺之才成为当时翻译罗曼·罗兰剧作最多的中国作家。

罗曼·罗兰的译名变化很少，至多简化为罗兰两字而已。

十、其他的法国作家

除以上九项所列出的法国大作家的代表之作外，在二十世纪前叶介绍到中国来的法国小说还有多人多种，其中不乏精湛之作。因篇幅所限，只能择其精要，以时间为序（截止到20年代末）选列如下：

普雷沃的《漫郎摄实戈》，1907年由商务印书馆译出并发行，此小说今译《曼依·雷斯戈》；1913年林纾与王庆通合译圣·比埃尔的《离天恨》，成绍宗1929年的重译本取名《波儿与薇姑》；第二年，林纾再与李世仲合作，将布律诺的《孤儿历险记》译成中文；在随后的一年中，林纾频频推出新作；年初，他

与王庆骥合译孟德斯鸠的《鱼雁抉微》，即今日之《波斯人信札》；不久又与王庆通二度携手，推出洛蒂的《鱼海泪波》，即今日之《冰岛渔夫》，辟厄略坻则成为林纾笔下洛蒂在中国的第一个译名。这一年还曾出版发行了马洛的《苦儿流浪记》，由包公毅（包天笑）执笔翻译，这是解放前广为流行的一部法国哀情小说。勒伯朗的系列惊险小说《亚森罗平奇案》在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的后期大量传入中国，与英国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探案》齐名。1917年周瘦鹃将这两位大侠客斗智的《福尔摩斯别传》译出，随后《虎齿记》、《古城秘密》、《两雄决斗记》等罗平系列丛书一涌而上，为当时的侦探小说热又平添几分热闹。1919年卢梭的《奄密儿》问世，为信言所译，即今天的《爱弥儿》。他的另一名著《忏悔录》有多个译本，最早的一个为张竞生1928年所译；莫里哀的戏剧作品大多流行于30年代，但其中的代表作在20年代初已有人翻译；1921年高真常译出《怪客人》。同年顾千里又译《时髦女人》，李健吾的重译本名为《可笑的女才子》；1924年朱维基再译莫里哀的《伪君子》。象征主义诗人古尔蒙的小说《鲁森堡之一夜》1922年由创造社成员郑伯奇译出；巴比塞的小说《十字勋章》和《兄弟》皆出自刘延陵的手笔，均发表在1923年的《小说月报》上；拉封丹的寓言早有中译本，而第一部寓言集则由徐冬塘1923年译出，取名《蝉与蚂蚁》；伏尔泰的名作《干弟德》1927年由徐志摩从英文转译，傅雷的重译本取名《老实人》；同一年，顾均正也从英文转译了缪塞的《风先生和雨太太》；1928年王了一译出莫洛亚的《女王的水土》，它的正规译法为《爱的气候》；这一年，周颂棣和叶麀还分别翻译了戈蒂耶的《克兰丽蒙特》和贡斯当的《阿道尔夫》。

作为法国作家小说集，在20年代前似乎只有三种，一为林纾的《哀吹录》（1914年版），一为周瘦鹃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刊》之中卷《法兰西之部》（1917年版），一为《新小说二十

种》，旭人等译，1919年上海广益书局发行。

进入20年代，各种形式和版本的法国作家小说集逐年增加，普遍为一人单译的形式，即某一作家的小说专集，其中尤以李青崖对莫泊桑小说的翻译最为突出，1923—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三集，1928年后又由北新书局出版九集，皆以编号形式顺序推出。《莫泊桑小说集》还有袁弼1921年选译的一种，由中华书局印发。梅里美中短篇小说集1927年由曾虚白译出，取名《神秘的恋神》。《左拉小说集》共有两部，一部为毕修勺和宝桴合译，1927年发行；一部为徐蔚南独译，1928年面世。这一年戴望舒也以单人之力量译出贝洛和穆杭的小说集各一部，分别取名《鹅妈妈的故事》和《天女玉丽》。《法朗士集》和《佛罗倍尔短篇小说集》则为多人所译，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前附有多幅作者画像，弥足珍贵。另一种形式为一人多译，如徐蔚南的《法国名家小说集》（1926年），刘半农的《法国短篇小说集》（1927年），鲍文蔚的《法国名家小说杰作集》（1927年）和曾仲鸣的《法国短篇小说集》（1928年）等。第三种形式为多人多译，即法国诸家作品合集，如东方杂志社1923年编印发行的《近代法国小说集》上下两册；现代书局1928年推出的《法兰西短篇杰作集》等。这些法国小说合集的出版，无论哪一种形式，都较单篇小说的发行具有更多的优越性，它的出现，标志着法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上。

结 尾

20世纪初外国言情、志怪、侦探小说的盛行不衰，曾引起胡适的大声疾呼：“只译名家著作，不译第二流以下的著作”。^③而翻译笔法上的各行其事和杂乱无章，则使郑振铎多次提出建立专门委员会，以负责审定和统一外国翻译名辞的紧急动议。综观这段历史进程，尽管不尽如人意处是如此之多，却丝毫掩盖不了

那些先驱翻译家们将首批法国小说译介到中国来的丰功伟绩。他们的创业精神和锲而不舍的努力，开创了法国文学在中国传播的先河，当他们协力构建的法国文学大厦在中国巍然矗立起来的时候，这些先驱者的名字便被永久地铸刻在大厦的基座上，而受到后人的普遍敬重。

注：

①另有一说，《孤星泪》为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组织人员所译。

②王任叔（巴人）：《关于巴尔扎克》，1936年。

③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1918年。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本文责任编辑：冯惠民）